

上资料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有些学生在搜集资料时只是从网上摘抄,并不去阅读分析。况且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学生之间并不熟悉,因而也就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如果小组中某个成员或者几个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可能会让整个学习小组受挫。同时,由于网络教学中的学生本来就是因为网络的时空开放性才参加的,学生在网络环境中选择问题、咨询问题、选择搭档时,都非常希望教师或者其他学习者能够及时反馈信息。但从现在的交流技术来看,各成员之间主要采用论坛、电子邮件等非实时的交流方式,在交流过程中成员反馈不及时,常常会给学生带来困扰。

(四) 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较低

受我国长期应试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学生普遍缺乏开展网络学习必需的信息素养,缺乏信息意识和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学生在网络上进行研究性学习时不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和手段进行广泛收集、查找和检索相关的信息,不能有效利用、加工和创造信息,致使学生专业视野狭窄,观点陈旧,缺乏创新。以至于不能高效地完成网络环境下研究性学习的任务。

(五)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容乐观

目前开展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尤其强调教师在网络环境中的指导作用,所以教师的准备状态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的开设对教师提出了从未有过严峻的挑战,对教师的专业能力、科研能力、知识面、责任感和爱心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教师的网上教学指导能力还非常有限,在教学观念、信息技能、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急需提高。

二、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鉴于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条对策:

(一) 实行整体配套的改革,优化实施环境

硬件是基础,是把网络更好的应用于研究性学习的最基本的保障。例如铺设校园网络就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平台,完善校园网的设施,合理管理,随着学校建设的不断完善,各种数字化的网络设施的完备,使校园网络平台更加完善,从而使丰富的学习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为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

(二) 加快开发网上课程,优化网络学习资源

要开发高质量的网络课程,首先要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在组织、设计、制作、处理教学内容时注重学习情境创设,强调“情境”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注意信息资源设计;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自主学习设计;强调体现“协作学习”方式,注重基于网络教学策略设计。

另外,增加学习情境的人性化色彩,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友好快速的个性化交互界面。最后要借助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实现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风格,动态的组织、

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 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

辛 田

(榆林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体制变革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政治地位沦落、经济状况陷入困顿的结果,是知识阶层急于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春秋战国 教育体制 教育垄断 百家争鸣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体制曾发生过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末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随之出现了辉煌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北宋时书院的创设,随之出现了深刻理性思维的“宋学”;第三次是清末民初新学制系统的确立,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发端。这三次教育体制的变革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以及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怀疑的,因此应视其为三次教育创新。

考察这三次教育创新,不难发现,教育创新总是在旧有的教育体制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时期发生。春秋时期私学的兴起、教育垄断局面的被打破,正是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崩溃的基础上出现的。

一、先秦时期“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即士,属于贵族阶级的成员,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

(三) 转变教育观念,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研究性学习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接受性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主动地学习,为他们创设一个能主动探究的环境。学生也要更为主动地进行学习,充分展现自己的主体性,在开展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时,教师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根据学生的爱好和特长,激发他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兴趣,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性学习。第二,要善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才能使研究性学习顺利进行。第三,要让学生树立自信。自信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学习就更重要了,只有具有了自信才能不怕学习中遇到的任何困难。

(四) 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使教师失去了对学生学习内容的权威和垄断,开始处于被学生选择的地位,教师从个体走向合作。同时,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虽然被列入普通高中的课程计划,但这门课程没有大纲,也没有教材,它的组织实施主要靠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性地进行。虽然这有利于学校和教师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但也使那些习惯于只讲教材的教师无所适从。所以,在职教师从知识能力和心态调整上,都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必须加大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力度,使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

(五) 加强练习和指导,提高学生信息素养

代知识阶层乃是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的载体。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从许慎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所谓“士,事也”,所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都是认为“士”乃是古代社会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对“士”的原始形态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化引起士阶层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以前,士阶层居于贵族体系的下层,是社会政治体系的基础。随着血缘宗法体系的破坏,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之公族尽矣。胙闻之,

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使用电脑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使用电脑进行学习、进行交流、进行沟通的习惯与能力。利用电脑,不仅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习的缘力与兴趣,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同时,信息素养的培养缺少了理论结合实践,只有将实际问题引入教学中,才能让学生真正掌握自主学习的本领,学习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另外,熟练地从网络中获取信息、使用信息,还必须熟练掌握相关的信息科学技术,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才能顺利开展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

(六) 改善评价方法,完善评价体系

研究性学习的目的不单纯是理解前人的知识,而是让学生进入主动探求知识的过程。对于学习者来说,学习是探索未知领域的活动。面对不同的问题情境与学习个体,不存在简单单一的评价标准。因此,评价不是为了区分学生,而是为了调节学习者的行为。在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中,评价的主体不是一元而应是多元的。另外,合作小组中的互相评价也是不可缺少的。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研究性学习中,亲身体验贯穿探索的始终,评价致力于促进经验的转变,但任何人的评价都必须建立在学习者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最终才能实现自我意义的建构。

作者简介:刘梅(1973-),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师范学院讲师,教育技术学硕士。

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臧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臧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这条史料虽然是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信，贵族沦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既然此时已是“公族尽矣”、“臧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以推测这个趋势由来已久。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次，士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重要，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

再次，士阶层越来越走向知识化。

春秋末期以来，随着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关于私学兴起的时间尚有待考定，但至少孔子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孔子回答卫灵公和孔文子的“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一类的话可以看出，孔子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社会政治领域，所谓“学而优则仕”本身就是士阶层知识化的目标所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1]。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自然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因此，最早建立的几个王朝都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如商代的统治仅仅是一种方国联盟，中央难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即使是周代也只是将宗法制度发展到了极限，却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在血缘宗法政治盛行的周代，其政治权利的重心与君主专制所要求的相反，反而呈现出一种不断下移的趋势。

于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建立政权、统治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统治思想。这样就把知识阶层的知识活动从单一的祭祀占卜发展到现实的政治理论的建设。具体表现为成王时“兴正礼乐”，用礼乐制度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思想观念领域一枝独秀。其运作方式是将礼乐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主要是上层社会成员的内在观念，并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中国早期的“士”在现实政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体制的改革

对于纯粹依靠血缘宗法观念组织起来的早期社会，最大的隐患就是由于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疏远，从而引起宗法体制的松散，甚至崩溃。因此教育每一个贵族成员尊祖敬宗、恪守礼乐制度乃是极为必要的，故曰“学在官府”。

从古代对“师”的解释，可以看出诸子的理论渊源。《说文解字》认为师者，“二千五百人为师，众意也”。“众”可指民众，所以古代军事编制称“师”，由此引申，帅众掌众之官也称为“师”，故“师”又训长，即官长，或称官师。西周金文所见之“师”，既是军政官员之名，又是教育官员之名，这显然是“师”作为帅众之官，同时因为“学在官府”的原因，其有对士兵进行军事教

育和政治教化的职责。因此“师”又进而成为有以教育人者之称。

有师则有教。《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最初表示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尚书·酒诰》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听朕教。”《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对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有很好的例证：晋文公在十九年流亡之后，回国首先是教育百姓，使其明义、明信、明礼，然后用兵中原，一战而霸，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于古籍。“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不仅是诸侯国君重视“教”的作用，“教”其实乃是一项古代的政治传统。

战国以后，血缘宗法制度开始解体，由此引起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旧的精神力量的衰落、社会规范与控制作用的丧失，旧的制度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内部冲突发生，呈现纷乱的状态。其中首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此引起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带来社会流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应该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改变了传统的垄断教育制度，从而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

《淮南子·要略》所谓诸子百家出于解救时弊，是在强调学术发展的社会需求。据《晋书·地理志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诸侯国家朝不保夕，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因此，不仅各国诸侯都在寻找智能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而且社会上的仁人君子，也在谋求行道术以救世，等而下之，也有欲图游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再加上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编户齐民政策的形成，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有博取功名的可能，所以，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平民从事学问者也越来越多，诸子百家就此兴盛起来，从而导致中国古代教育体制出现了第一次巨大变革。

春秋以后，“士”地位沦落，流入民间。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魄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形成一个数量庞大、人等复杂的士阶层，“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1]于是社会进入被许倬云称道的“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

可是，世事有利有弊，福祸相连。士人数目的众多，难免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无形中促进了士人的平民化。其典型代表就是管仲在齐国的改革。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虽然没有像战国时代的改革一样完全与旧体制决裂，但已经开始了对血缘宗法制度的背叛。比如“叁其国而伍其鄙”就是对血缘族居的改变，而“四民分居”更是不但体现了对宗法制度的否定，而且在法律上重新规定了士人的社会地位。由此，

士人从“公卿士大夫”之“士”降为“士农工商”之“士”了。

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人政治地位沦落的直接结果就是士人经济状况的恶化，也间接带来了教育体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破坏导致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士人纷纷从贵族阶层衰落到平民阶层，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举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极为恰当的。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最先给予士人的震惊，就是困顿的经济状况。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孔子对颜回的这段表扬可谓无以复加，但却无法掩盖颜回一生贫困潦倒的尴尬。即使是孔子本人，经济状况也是非常之差，“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在战国时期，如孔子一样的贫士屈指难数、俯拾皆是。有理由相信，今天后人盛赞不已的战国养士之风，表面上是战国时期尊重人才的表现，其实却潜藏着大量贫困游士衣食无靠、不得不托庇别家的尴尬，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毕竟只是个别现象，生存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以批判和惋惜的心情比较了古今士人的差异：“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执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谄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恇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誉者也。”即使是千载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荀子在发出这段议论时善意的出发点。

李斯在辞别老师荀子西行入秦的时候，曾经非常感慨地对老师说了一段话，也许能够使得荀子原谅那些所谓“败德无行”的士人：“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3]

的确，所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真实道出落魄士人的痛定思痛，联想到李斯所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宏论，就可以理解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现的经济原因。

参考文献

- [1]《史记·孔子世家》。
-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 [3]《史记·李斯列传》。

作者简介：辛田，男，陕西清涧人，历史学博士，榆林学院历史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